

沈醉·往事

我这 三十年

30年，大起大落，
30年，大喜大悲，
一个忏悔灵魂血淋淋的自白。
发行150万的畅销记录。
有人比之为卢梭的《忏悔录》；
胡耀邦则说：写回忆录
就应该这样，有什么写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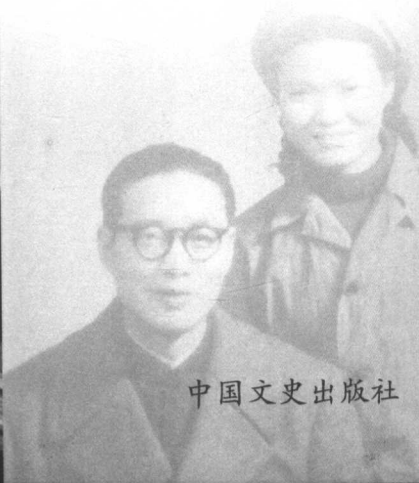


中国文史出版社

沈醉·往事

我这 三十年

沈醉 口述 沈美娟 整理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这三十年/沈醉口述:沈美娟整理. —北京:中国
文史出版社, 2005. 1

(沈醉往事丛书)

ISBN 7-5034-1595-9

I. 我… II. ①沈…②沈… III. 沈醉—回忆录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8129 号

责任编辑: 韩淑芳

封面设计: 杨飞羊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100811

印 刷: 中国文联印刷厂 邮编: 100044

装 订: 中国文联印刷厂 邮编: 100044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9.375 字数: 240 千字

印 数: 5000 册 插页:

版 次: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总 定 价: 75.00 元 (全三册) (本册定价 25.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我这三十年

目录

MU LI

前言 1

身陷囹圄,反感抵触 3

军管会接管监狱后,没有释放我,我便开始胡思乱想起来,后悔不该参加起义,不但没保住自己,还连累了部下和朋友。

押迁重庆,一波三折 17

一个月后,档案整理完了,大家正焦急地等待下文,突然一个看守人员兴冲冲地跑进来,说:“恭喜啦!你们的好事来了。”听到这句话,我们一时都愣住了。因为过去在监狱里,“恭喜”就等于是要处死。

春风化雨,开始认罪 28

有一次,我和一个管理人员刚走到由原中美合作所大礼堂改建的烈士陵园附近,突然有几个人把我揪住,要我还他们的父兄,说:“生要还人,死要还尸。”面对这些愤怒的受害者家属,我羞愧难当,只好一个劲儿地向他们认罪道歉。



我这三十年

目录

MULU

真诚相待,接受改造 38

杜聿明的这番话,使我非常感动。我想,倘若不是共产党改造政策的英明、正确,不是共产党的胸怀宽阔、真诚相待,杜聿明这个赫赫有名的国民党司令官、忠心耿耿效命蒋家王朝的将军,怎么会说出这样一番话?怎么会发出这样的感慨?

战犯所内,趣事连篇 46

如果没有那高墙、铁窗,我会觉得这里是“养老院”或者是“幼儿园”。因为大家生活轻松、精神愉快,似乎都是无忧无虑的样子;也是因为他们生活上完全不会自理,确实像一群需要别人照顾的孩子。

劳动改造,净化心灵 61

初到农场,一切都是那样新鲜,那样陌生。许多人指韭菜为小麦,指青草为玉米苗。特别是廖耀湘,看见地里长的胡萝卜就喊道:“看,这么多的香菜呀,我最爱吃了!”管理员告诉他说:“这是胡萝卜。”他还不信,坚持说:“我们湖南老家的香菜就是这个样的!”



首批特赦，榜上无名 74

随着法官那时起时落的声音，我的心像闪电一样交织着两种感情，一是喜，二是忧——喜的是自己熟悉的好友、同学得到新生，忧的是还没有听到念自己的名字。

改恶从善，终获新生 87

没想到叫到第九名时，居然叫到了我。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旁边的管理员推了推我，说：“叫你啦！”我才大梦初醒般地站了起来。

总理教诲，没齿难忘 96

周总理说：你在军统那么多年，跟在戴笠身边那么久，你把军统的内幕如实地写出来，不论是你自己干过的，或是看到和听到的那些阻碍革命、屠杀革命人士的等等见不得人的东西，都揭露出来，让后人知道革命的艰难和反革命的残暴……

爱妻别抱，五内俱焚 106

她一个弱女子，在那弱肉强食的社会里，不



改嫁又如何生存呢？我可怜雪雪，也怨恨自己，当初我就不该把家人送到香港那个鬼地方去。

政府关照，温暖如春 117

那是1963年的11月10日中午，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接见了我们在京的四批特赦人员及其家属。在酒席宴上，周总理对我说，他看过了我写的东西，并希望我把自己知道的都写出来。

自由天地，冤家路宽 129

我到全国政协以后，在许多场合，遇到过许多过去直接或间接接受过我和军统特务迫害的民主人士。

化敌为友，握手言欢 140

我并不希望分配到全国政协，因为在全国政协的许多领导和委员们，不少是受过我或军统特务迫害的。当时我认为，民主人士的气量不可能和共产党员一样宽宏。

旧地重游,感愧万千 152

火车一到上海,我就感到心跳得很厉害。上海是我开始反共反人民的地方,也是我曾经干过罪恶活动最多的地方。现在我既怕到上海,又想到上海。

西北参观,心悦诚服 166

延安的人们对杜聿明也很感兴趣,无论到哪里参观,许多单位的负责人都爱用陕北话和杜聿明夫妇交谈。杜聿明激动地对我说,他真没有想到,家乡人会这样热情地接待他。

风云突变,不祥之兆 175

1966年6月3日,上午天气还是晴朗的,下午开始转阴,傍晚下起雨来。这一天气的变化,真仿佛是预示着当时时局的变化一样。

“文革”初期,溥仪病故 183

在他病重垂危时,我再也忍不住了,便趁中午休息时溜进了医院。只见他鼻孔里插着氧气管,脸色难看极了。当他发现我站在他身旁时,



我这三十年

目录

MU LU

两眼泪汪汪地看了我一下。

“宾客”盈门,要写材料 190

找我写材料的越来越多,有时一天十多批,几十人。我住的地方小,房里坐不下,许多人便站在院子里。

二度入狱,重返秦城 199

我想,要是那些过去和我在一起改造、现在还没有得到特赦的战犯们看到我又“二进宫”,真不知作何感想!

无中生有,疲劳轰炸 211

我越装模作样地表示难受,他们当然就越开心,越认为这样一来,不消多久,我吃不消时,就会苦打成招了。而我却暗暗好笑:你们这些家伙,就这么几下子想整倒我?还是好好跟我学上几年再说吧!

旧敌新友,情同手足 220

一看他的面貌、身材,特别是听到他那一口



我这三十年

目录

MU LU

湖南话,我就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上海。但眼前活生生的事实告诉我,过去曾被我监视甚至准备逮捕的革命人士,今天却和我同被囚禁在一个牢房内。

单身牢房,度日如年 230

我一个人被关在单人房间内,那种苦闷就甭提了。就是四个人关在一起时,也还要受到不少折磨。一天到晚,不是写材料,就是被提审。

总理逝世,山河同悲 236

我长这么大,什么稀奇古怪的场面都见过不少,可像这种一个人死去会使得人人哭、家家哭、全城哭、全国哭的事,不用说看,连听也没有听到过。

揪出罪魁,中国得救 246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倒不一定。可是“四人帮”被粉碎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凡受过“四人帮”迫害而幸存的人,都能翻身,这却是事实。



我这三十年

目录

MULU

香港探亲，共叙天伦 258

一些人听到我即将与我的前妻见面，便认为一定会发生一场“全武行”的打斗，而且是可以轰动一时的好新闻，都争着要抢拍这一消息。然而我和我的前妻及其后夫见面时，却大出他们意料……

“苦海无边”，岸在北京 268

我不想再在香港待下去了。女儿也看不惯、过不惯那种生活。两人一合计，还是早点回去。又赶上心脏病在慢慢发作，我怕万一死在香港，我这一辈子就说不清了。

尾声 282



前 言

1980年12月18日傍晚，我女儿兴冲冲地跑回家。一进门就喊：“爸爸，告诉您一个好消息。不过，您不许激动。”孩子知道我患有心脏病，不能生气，也不能太兴奋：“什么事？你说吧，我不激动。”只见她背在后面的手里拿出两张灰蓝色的卡片说：“您看！这是什么？”“哦！港澳通行证。”卡片上清清楚楚地印着“港澳通行证”五个字。这么说，我和女儿申请去香港探亲的事，政府已经批准了。我不得得心头一热，情不自禁地流出了眼泪。

这不是做梦吧？30多年了，江流日日，梦魂夜夜，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海外的亲人，常常在睡梦中梦见她们。此刻，往日的情景立即涌上了我的心头。

记得那是1949年10月间，蒋介石逃台之前，特意下命令给我，要我“站住脚跟，守住云南”。为了让我表示“不成功，则成仁”的决心，他还要我将一家老少一个不剩地都用飞机送往香港。

临送走她们之前，白发苍苍的老母哭着不肯上飞机，要和我一起留下，我只好把她老人家抱上飞机；年轻温柔的妻子扑在我怀里，泣不成声，依依不舍；天真可爱的孩子们听说坐飞机走，高兴得拍手直跳，但在我把他们一个个抱上飞机时，他们见我不和他们一起走，就搂着我的脖子娇声娇气地说：“爸爸，你可快来啊！……”

事隔30多年了！老母已经过世。儿女均长大成人，成家立业了。妻子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已改嫁他人。但往日的恩爱之情、

我

这

三 十 年

骨肉之亲却是终身难忘的啊!我总希望有一天能见到他们,当面向他们道歉,求得亲人的原谅,因为我没有尽到做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不过,话又说回来,我毕竟是曾经在历史上有罪于共产党、有罪于人民的人。老实说,我自己也不敢相信,像我这样的人,居然能够得到批准去香港,并且准许我在大陆惟一的女儿一道同去。我真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然而,两张“港澳通行证”清清楚楚地告诉我,这一切都是真的。我很快就要和海外的亲人团聚了,这不正说明了共产党和人民对我的谅解和信任吗?面对这突然降临的喜讯,我怎能不老泪纵横呢?

12月23日,我偕女儿终于来到了香港,见到了许多亲朋好友。旅居美国的女儿和远在加拿大的侄儿均来港团聚。只有居住台湾的儿女不能来港相见,这是我此行最遗憾的事。

我多么想见到他们,多么想和亲人们在一起多呆些日子啊!有些亲友劝我留在香港,并愿对我赠送巨款;或者劝我去台湾,并愿负责帮我办理去台湾的手续。他们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你何不乘机远走高飞呢?”对亲朋好友的善意,我不能领受,婉言谢绝了。

我执意要回北京,正如香港《新晚报》1981年1月29日报道的那样:“……尽管来到了这个东西方的十字路口上,他并不彷徨。说要回去,就回去了,说要在春节前回去,果然在春节前回去了。”许多亲友不解地说:“你过去那么精明能干,现在怕是老糊涂了吧?你能活着出来多么不容易啊!你也不想想,这30多年你是怎么过来的,难道你对大陆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吗?”

是啊!这30多年,我是经过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的。我是怎样走过来的呢?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很好地回顾一下。这不仅是对我自己的回答,也是对我在海外的亲朋好友的回答,对读者的回答,对整个社会的回答。



身陷囹圄，反感抵触

1949年12月10日，我签字起义后，以为很快将获得自由，与家人团聚。然而事态的发展，却完全出人意料。起义通电发出的第三天，第二十六军和第八军不但没有按起义通电的要求服从卢汉指挥，反而开始了对卢汉的进攻。第二十六军从东南角开始向昆明进攻；第八军驻在大板桥的一个补充团，也与卢汉的保安团打了起来，形势越来越紧张。这时，卢汉发表了李弥和余程万为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委员的通电，但是局势并没由此缓和下来。

一天上午，云南保安旅旅长龙泽汇陪李弥的妻子来见李弥，并传达了卢汉希望李弥通知部下不要攻打、听候改编的意见。李弥按卢汉的意见写了一封信，交给他的妻子，送到大板桥去。当天下午，李弥的妻子就回来了，并带来了一封复信，信中表示愿意接受李弥的命令，并提



28岁晋升为少将总务处长
(1942年)

出让李弥本人早日返回部队的要求。李弥把信交给了杨文清，杨文清便拿走这封信送给卢汉去了。等杨文清他们一走，李弥的妻子见室内没有旁人，便把自己的旗袍掀起向着李弥。李弥伏身一看，原来在他妻子的旗袍里子上，用毛笔写了几行小字。这也是他部下给李弥的一封信，内容却与刚才那封完全相反，说全军的官兵表示：不但不准备停止进攻，而且要竭尽全力攻打昆明，救出李弥。

第二天，第二十六军和第八军果然集结了所有的部队向昆明进行猛烈的袭击。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卢汉便将李弥和余程万放了出来。第二十六军还是不同意，一定要师长石补天返回部队，卢汉只好又把石补天也放了出去。他们出去之前都满口答应，归队后，一定制止部队攻打昆明。结果，李弥等人出去后，不但没有停止对昆明的进攻，反而打得更加激烈了。这两个军的装备和人数都远远超过卢汉的几个保安团，形势越来越紧迫，昆明眼看就要被攻下了。卢汉怕我们出去后会与李弥一起攻打昆明，就继续把我们软禁在五华山省政府办公大楼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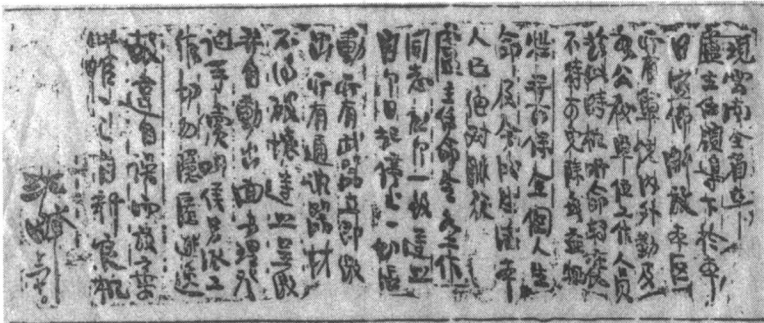
12月19日上午，台湾派来的飞机开始轰炸五华山，卢汉已作好了随时突围的准备。因为怕昆明被攻破时，带着我们突围会增加麻烦，他便将我和李楚藩、沈延世（国民党空军五军区副司令）、童鹤莲（宪兵西南区司令部副司令兼参谋长）四人移送到了钱局街陆军模范监狱。由于飞机不断地轰炸五华山，我们也乐意离开那里，免遭不测。

尽管李弥等实力雄厚，但卢汉在云南人民的全力支持下，终于击溃了他们的进攻。加上人民解放军已经向云南挺进，李弥只好率部仓皇逃往滇缅边境，最后还在边境骚扰了多年。

1950年3月，人民解放军进驻昆明后，实行了军管。卢汉在办理移交时，把我们在陆军监狱的人都当成要犯交给了昆明军管会。当时，我对这种情况一点也不知道，还满以为：我的绝大部分部下，已按我的手令，将电台、武器都交了出来，并没有参加李弥的反攻



战斗。现在战局平定了，我的问题总该得到处理了吧。可是，事与愿违，解放军接管陆军监狱之后，这里的情况完全变了。原有看守和负责人都已大部撤换，制度比过去严格得多，我的行动受到了限



1949年12月，云南起义时亲手写的起义通电

制，关押的性质也变了，因此，思想越来越抵触。

在这之前，卢汉将我转移到陆军监狱关押时，我的思想还很乐观，认为自己在监狱不过是暂避一时而已，只要战事平定下来，无论谁胜谁负，我都是可以出去工作的。若中央军取胜，自然会救我出狱，官复原职；若卢汉的保安团取胜，同样会因参加起义之故而释放我。心想在这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时刻，自己能在这个“保险箱”里坐观龙虎斗，倒也是不幸中之万幸。

陆军监狱是我过去与之常打交道的地方，这里从上到下的工作人员几乎都认识我。我曾到此陪审过案件，典狱长和总务主任等人都待我为上宾。此刻我被关到这里，看守们出于职责而不敢放我出狱，但给予我最大限度的自由。在这些人的心目中，我还是过去那个可畏可敬的“云南区专员兼军统局云南省站站长”。《云南日报》上发表的起义通电和我的亲笔手令，他们都早已看到，也都认为我在此关押只是暂时的，将来出去以后，还会像过去那样威风凛凛的；在我关押之时，给我一些关照，日后若有求助于我的地方，我也

我

这

三

自然会给予方便。所以,无论是监狱长官还是看守,替我办事都很殷勤,多方对我给予便利。

十

我在狱中,不仅可以四处走动,任意吩咐看守买东西,送信,打听情况,而且当我母亲和妻子生日时,我说一声“给我往香港发个电报”,总务科长就立即帮我发出去,我就在电报里向母亲、妻子祝寿和问候。生活无拘束,倒也蛮舒适。

年

还有是同狱的许多旧部下和国民党军政界的一些犯人,并不因为我被关押,而一反过去对我的态度。他们仍像以前一样尊敬我、体贴我。吃饭时,我常常在馒头里发现他们对我进行安慰、让我保重身体的纸条。我过去从来不打牌,更不会打牌,他们为了让我开心,每当白天没事干的时候,就来拉我去打牌,而且每次都让我赢。我常开玩笑地说:“这可真是在鸡脚杆上刮油啊!”

实际上,我当时并不缺钱花。昆明的几个大资本家,如西南银楼专作金银首饰生意的孙子顺等,因为解放前我帮过他们不少的忙,他们在我被关押时,常常给我送钱送物。有一次,监狱不让孙子



周养浩



徐远举